

关于公共政策研究范式问题的讨论

米加宁¹, 徐磊²

(1.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01; 2.北京理工大学 学报编辑部, 北京 100081)

摘要: 公共政策问题内在的复杂性, 使得其研究范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的应用, 支持了不断试错的进化主义认知理念, 支持了基于仿真环境的群决策方法, 由此还可以在虚拟现实中进行未来场景的推演和校正, 这些构成了新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

关键词: 公共政策; 研究范式; 复杂系统; 建模; 仿真; 进化主义; 群决策方法

中图分类号: C934;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0)02-0016-05

一、问题的背景

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需要确定其研究理念、方法和工具, 理念、方法和工具统一构成研究范式。较之其他研究领域, 公共政策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研究范式的问题, 其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 价值和制度背景预设

公共政策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从来不是纯学术的问题, 而是与政策当事人息息相关的利益评价与选择问题。研究者的价值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研究结果; 同时, 具有政策影响力的相关者——包括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受众——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研究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

保持韦伯所要求“价值中立”的立场^[1], 高山仰之可矣,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未必可能。与其虚设所谓“客观的中立立场”, 以研究公共政策为事业的学人, 倒不如选择罗尔斯所倡导的第一原则: 在利益选择中优先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2]。时至今日, 弱势者包括困苦无告的群体, 也应当包括在人类技术肆虐下沉默的自然和行进在灭绝之路上的其他生灵。试想, 一项公共政策若是已经惠顾到了最为边缘的利益相关者, 其他群体的利益可能没有优化(尤其可能没有实现基于贪婪的最大化), 但其结果应该离“良知和合理”不远。公共政策既然不是价值无涉, 它就应当是一种具有良心的知识, 就应当具备一个“善”的前提, 尽管此“善”的界定和实施可以众说纷纭。

应当保持警惕倒是, 一些政策的制定或执行者, 口称“整体”利益, 实则覆盖或剥夺它人“局部”的、“具体”的利益。实际上从来没有抽象的“整体”

利益, “整体”的背后一定藏匿着“具体”的操作者, “整体”常常成为特定利益操作的挡箭牌。

事实上, 可实现的“整体”利益, 需要利益相关者的相互沟通和协商, 需要透明的相互妥协, 需要尊重和执行既成的协议, 需要公正、权威的法治环境。从此意义上讲, 实现整体利益依赖于社会的前提条件: 公民有机会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 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协商机制和秩序。当然, 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 提供的公民意见表达的自由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的差异巨大, 但至少要达到一个弱的秩序标准, 谈论公共政策才有意义, 后面将要介绍的技术型手段——如复杂系统建模和仿真方法, 群决策方法等等——才不至于是一种摆设。

(二) 处理复杂系统的认识论趣旨

20世纪以来, 人们对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有了切身的体会。自然科学的进展, 曾经是人类标榜理性认识能力最为重要的依据, 然而, 海森堡、歌德尔、莫诺等人工作, 瓦解了近代以来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的科学认识确定性的信仰^[3], 于是, 人们接受了波普尔“问题—假设—检验”的进化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 接受了库恩更具历史主义色彩的“科学范式”理论^[4]。科学失去决定论的逻辑基础, 并没有出现波尔兹曼所担忧的“科学末日”的混乱局面, 恰恰相反, 更具有探索性、约定性范式特征的新兴科学表现出更大的活力, 甚至在不可逆、不可重现、非线性关联的复杂现象领域, 逻辑上不可通约的问题似乎也有了可解的希望。

实际上, 指望一种确定性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地指导所有科学的实践, 是人类心智尚不成熟的表现, 是“图腾和神话”崇拜的遗迹。相反, 所谓

收稿日期: 2010-01-25

作者简介: 米加宁(1959—),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E-mail: mijianing@126.com

“后现代”科学,正视不确定的现实,依据人类心智模式的多样性途径对科学问题进行多元的探索;而科学共同体的内在规则——包括价值标准和竞争选择机制,又使得多元的科学活动能够有序地展开。关键是科学的规则,必须得到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自觉认可和遵循,规则的兼容性应当能够为多元的科学活动提供秩序的依据。

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实际上人们有必要反思、选择和设定与科学问题相适应的研究范式,在观念、方法和工具各个层面,确定研究有效性的条件和界限,使得基于有限理性的研究程序和结果具有可评判的信度。多元而有序,这是人类心智和社会建构成熟的标志,多元使得人类知识和实践的进化有了更多的选择基础,进化由此成为人们可能的救赎和升华之途。

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科学所面临的理论和方法的不确定困惑更是可想而知了,探讨公共政策研究范式并不承诺一劳永逸地给出解决问题的神丹妙药。计算技术、仿真技术等新兴研究工具的发掘,尤其是自适应复杂系统(CAS)建模与仿真的技术,似乎在显现社会场景的艰难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步。

据此,在此所探讨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工具的选择上有着特定的趣旨。就认识论而言,我们所期待的社会知识,不同于概念和逻辑引伸出来的定性知识,也不同于利用数学演算的定量知识,前者过于模糊难以检验,后者过于抽象失去了复杂的多样性;我们期待拥有一个社会建模和仿真平台,它能够容纳多样化的主体(Agent),封装于主体的特定行为规则决定了主体的性质,系统粒度设计确认了系统层次的类型划分,在这样的平台上,主体自适应地相互通信,决定各自的行为策略,这些主体行为的集合或许能够仿真特定的社会现象及其演进轨迹。这种仿真是动态的,其显现的主体系统的演进路径和结果虽然不可预期的,但是它们是真实世界可信的映射集^⑨。

因此,研究者与其说是在推演,不如说是在观望仿真系统的展现,在解读仿真平台所涌现出来的结果,在尝试性地赋予其意义:仿真的结果显然不会是社会现实一一对应的展现,但是它是社会变化可能状态的映射;人们不需要假定映射表征着“本质”的属性,映射只是透露出复杂系统隐秩序的信息;展现意味着“现象”存在,解读是其获得意义必要的后续过程;更令人期望的是,仿真的展现和解读面对的不仅仅是过去和当下的可能状态,它也包含未来可能发生状态的信息,虽然目前人们构建主

体模型和动态仿真系统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还十分稚嫩,但是,它所预示的解读未来的可能性唤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⑩。

(三) 解题模式

仿真方法以其动态展现研究对象的特定方式,成为不同于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的第三类研究方法^⑪;这种方法需要建模仿真和可视化处理的技术和工具支持,需要在仿真映射的状态集合中解读现实的轨迹。因此,仿真方法的解题模式包含建模分析规则、仿真和可视化技术处理规则以及结果鉴别和解读的规则。这些工具性的规则应当与研究理念、认识论约定及其研究方法相互协调,由此才能构成所谓的研究范式。

总之,公共政策研究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其中诸多利益主体的纠葛涉及到价值判断与选择的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动态的主体之间关联关系的实证分析及解读问题,涉及到对主体系统状态变迁的预测问题。因此,研究过程需要谨慎地界定问题的性质和边界,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参量,构建模型,采用与问题复杂性对应的解析工具。公共政策的研究范式应当包括价值判断,解题方法和工具指南等三个层面的规则,以下将对此进一步分解。

二、研究范式的轮廓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是理念、方法和工具的统一体,它应当具备以下轮廓性特征:

1. 构建研究范式的前提是对问题真伪和研究意义的价值判断,在公共政策研究中问题真伪取决于问题的现实性及其已有的解题状态,研究意义取决于预期结论的价值倾向和影响程度。

2. 研究范式还应当提供关于知识边界和问题边界的设定原则,提供选择工具包的标准。面对复杂的认知对象,对问题的解析及其相关知识的开掘过程,是不断探索的,知识累进和迭代的过程;仿真解是系统演进路径的描述集合和可信映射。因此,基于“有限理性”的原则,研究者设应当定问题的边界,取舍系统的粒度,调试系统的参量,校验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确定可视化处理的策略^⑫。

3. 面向复杂系统,必须利用有效的计算工具建立系统模型,进行思想试验;必须采用系统仿真等可视化处理的程序,提供政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共享的知识和语言界面,提供与公共政策对应的民主决策平台。

4.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工具层面严肃游戏作为一种社会仿真手段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其中的道理在于:(1)在严肃游戏中,复杂系统的

主体被置换为游戏角色,它们同样可以封装行为规则,角色和环境的关系同样可以被预设;(2)角色之间的博弈关系可以是现实主体间博弈关系的映射;(3)游戏预设的环境条件和角色行为特征,对应着巨大容量的游戏状态空间,每一次游戏出现哪种结果是路径依赖的,并不能事先决定,现实主体系统的情况也是如此;(4)严肃游戏还具有系统认知和行为引导的教育和培训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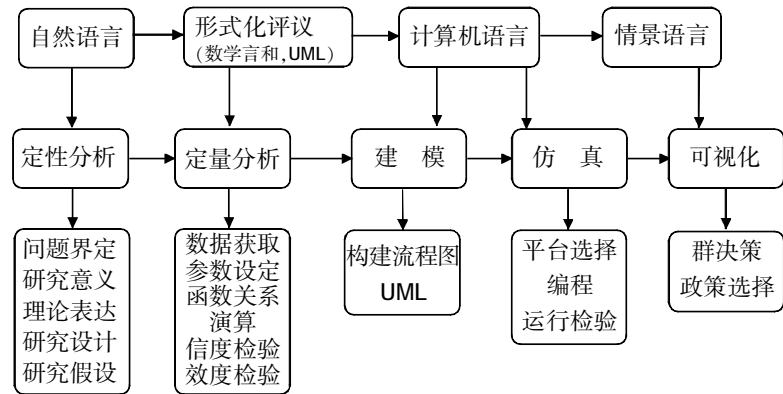


图1

三、基于有限理性的认识论原则

严格说来,认识论本身并不是提供有效知识的处方,不同主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现象,本质上是不可能完全认知,预测或控制的,仿真系统并不能指明哪些展示的状态是实际发生的,实际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状态需要人们去识别和解读。

就此而言,仿真系统的认识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与不断演进的现实系统并行的仿真系统,它呈现的状态有可能与当下的状态契合,人们能够透过仿真系统窥见真实系统的隐秩序。

按照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原理,利用复杂自适应主体构建的系统模型,并不需要对主体及其关系做出特别的假设,实际上,主体间相互作用经历若干周期的迭代之后,就有可能涌现系统的隐秩序,就像现实世界自发秩序的涌现一样。

基于上述认识,公共政策研究需要对问题和结果作一些限定和预期:(1)问题的边界,公共政策问题应当与可掌握的主体、系统和环境的信息相匹配,其状态处于可显现的范围内;(2)适应性解决方案,人们所寻找的公共政策解决方案不是刚性的,相反,它是具有柔性的适应体,即政策必须适应环境,而且要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3)知识动态进化,研究或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是不断解读系统信息的过程,是一个知识的汇集和生成过程,解决方案的生成是研究团队共同工作的结果,知识需要在组织内不断地流动和升级;(4)问题复杂性与解决手段可行性之间应当均衡,这种均衡影响着模型的信度;(5)模型的确认与检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模式,其模型设计与运行,应当与解决问题的需求相吻合,应当具有回答问题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四、语言转化与处理

从技术和语言学的角度讲,利用分析工具表述

研究对象并以仿真方法予以显现,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语言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

基于自然语言的问题分析框架和表述逻辑,要通过UML等中间程序转换成计算机软件语言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建模的参量、约束条件及其问题边界的约定,必须遵从自然语言的基本分析逻辑。可视化处理的宗旨,是寻找专家语言系统与大众语言系统的共同界面,这是进一步引入群决策机制的前提条件。

五、可视化与群决策

由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获取信息模式,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文本信息时代正在结束,电子技术所支持的图像信息将成为更重要的信息记载、传输和存储形式。与此对应,以仿真或视频信息方式表达社会现象和过程,将成为更加常见的思想互动方式。也许,它会引起人们所担心的思想表层化的问题,但是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图像语言能够更有效地跨越文化传统、语言背景及其专业知识差异所造成的交流障碍,在相关群体中建立图像语言的共识^[9]。可视化技术为各利益群体共同理解、参与和交流公共事务的认识提供了可能共享信息的界面。

在由技术、制度和观念等子系统构成的文明体系中,技术往往是更为活跃的部分,技术变革为制度甚至观念变化创造机会,它本身并不等于制度安排本身的变化,制度变迁还需要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组织秩序的变化。但是,纵观近代以来信息技术的所有变化,其结果总使得人们能够更便捷、更广泛地获取信息,共享知识,更多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据此找到了更为有效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载体和渠道。由此而论,群决策恐怕是网络技术、可视化技术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从制度形态的角度讲,近代以来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是不

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技术的进步使得屏蔽各阶层广泛参与社会决策的技术性和制度性壁垒纷纷瓦解,因此,更广泛、更有效的公共事务群决策一种历史的趋势^[10]。

群决策概念的引入,意味着决策过程必须构建更为广泛的认识论基础。实际上,探索性假设、有限理性的方法论以及选择性解读等概念还不足以覆盖我们研究范式全部认识论寓意,个体经验的参与及其整体知识的自发演进,同样是公共政策解题相关的认识论问题,其理由在于:(1)哈耶克在论述人类社会“自发秩序”演进的命题时,一再强调人类知识的本质形态是蕴藏于千百万社会成员头脑中的个人经验,科学理论可以整合其中一部分经验,使其成为可以共享的编码知识^[11]。但是,大部分个人经验则处于默示知识形态,它们只能在个性化的场景中表达和交流,涉及到公共政策问题,利益相关人在场的理解和表达并不能完全被代理。群决策就是要为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提供机制和界面。(2)CAS建模与仿真基于对主体特征及相互作用的认知,系统的整体性质只能在过程中涌现,相应的认识也将随之演进,这是各个利益相关主体与研究者之间不断信息互动的过程。

六、思想、方法、工具的统一

概括地讲,我们所倡导的公共政策研究模式具有体现了三种特征理念:有限理性、可信映射、认识多样性与进化。与此对应,形成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特征。在此研究理念、方法和工具应当在协同。

(一)研究理念

有限理性:认识者自身能力的有限性;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使得认识过程只能依据不完备的信息;认识结果的假设性。

可信映射与解读:研究所得出的逻辑语言结果或仿真演示,都应当满足有限条件下的检验规则;从经验的角度讲,它与已经获取的绝大多数经验事实相吻合;从逻辑的角度讲,它满足确认的逻辑条件;即使存在反常,结果依然具有较好的解释信度。映射结果需要专业性和参与性解读,才能充分显现其意义。

认识多样化与动态进化:系统研究者不是唯一合法的解读,利益相关者的默示知识应当在群决策的程序中充分予以表达;决策知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它需要通过若干周期的假设与检验的迭代过程;迭代过程也是知识不断适应性进化的过程。系统本身也处于动态的进化过程之中。

(二)研究方法

基于公共政策研究对象可分为三种类型:(1)相对静态的系统,宜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样本特性的统计分布及其与环境变量的相关性,是研究的核心问题;(2)非演化动态系统,核心问题是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宜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3)博弈演进的动态系统,这是与社会系统拟合度最高的系统模型,宜采用CAS分析架构,在此,主体标识、内部规则、粒度设计、流表征、非线性特征、遗传计算和迭代关系、学习和演进机制将是问题的核心。

统计与系统动力学方法已经十分成熟,CAS的建模与仿真的方法和程序则有如下特点:(1)本方法适应的系统是多主体聚集的系统,分析主体的行为规则和行为动机是研究程序的前期工作;(2)显现主体多样性的性质,需要根据系统识别粒度进行类型化处理,这涉及到主体的类型化和系统分层类型化两个方面,类型化就是对主体或主体层次赋予标识;(3)主体之间的作用可以选用“流”来表征;(4)根据主体对环境变化自适应的性质,主体之间非线性的关系可以在计算平台上自动演绎,这是动态的、适应性和演进性仿真方法的特性,由此可以建立一个与现实相互映射的仿真系统;(5)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是非线性的,其结果对细微的条件变化极其敏感,其分叉的结果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和多样化的特点,它是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下可能状态的集合,而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仿真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需要解读的场景;(6)仿真系统与真实系统之间存在并行学习的关系,仿真系统为理解和调控现实系统提供了技术依据,现实系统为校正仿真系统的提供模板,仿真系统应当是可进化的系统,其可解读的涵义也将不断涌现^[12]。

(三)研究工具

目前,我们团队采用Anylogic等计算软件和严肃游戏实现政策仿真,同时,已经投入使用的决策剧场为显现可视化仿真结果提供了场景环境。

Anylogic等计算软件支持多主体系统的建模,支持自适应系统长周期的迭代计算,支持一定类型的仿真显示。

严肃游戏可用于演示主体之间的博弈格局及其变化,游戏角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主体的行为及后果。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政策试验或场景经验培训。

可视化是消解专家与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语言障碍的重要方式,基于视觉语言的界面,政策语言及其寓意可以获得更广泛、更具有共识的理解,

这是群决策的必要的技术基础。

七、小结

总之, 公共政策研究所涉及到的技术条件、制度环境和思想理念基础的变化, 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认真思考其研究范式的问题。概括地讲, 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 提供了可视的可演绎的政策

场景, 使得公共政策的认知过程成为可以试错, 可以不断进化的过程, 群决策所面临的专家语言与公众语言的障碍也得以消解, 通过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现实也有可能进行各种公共政策试验。因此, 可以有信心地讲, 涵盖着公共政策理念、研究方法和试验工具的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形成, 它或许能够为解读公共政策研究的复杂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冯克利,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5: 26-28.
- [2]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4.
- [3] 沃森. 20世纪思想史[M]. 朱东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3, 67.
- [4] 罗森堡. 科学哲学: 当代进阶教程[M]. 刘华杰,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 [5] 霍兰. 隐秩序[M]. 周晓牧, 韩晖,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 [6] 波拉克. 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M]. 李萍萍,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7]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 仿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第三种方法吗[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 [8]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9] 豪厄尔斯. 视觉文化[M]. 葛红兵,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梅因. 古代法[M]. 沈景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97.
- [11] 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12] 方美琪. 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Discussions on Research Paradigm for Public Policy

MI Jia-ning¹, XU Lei²

(1.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2.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innate complexity of public policy requires close attention to its research paradigm.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techniques solidifies the evolutionist cognitive concept that continually tests mistakes, supports group decision-making method based on simulative environment, and thus can be used for deduction and correction in virtual realities, all of which form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for public policy.

Key words: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aradigm; complex system; modeling; simulation; evolutionism; group decision-making method

[责任编辑: 箫姚]